

书苑撷英

我们创造的历史 我们的中国梦

推荐理由:本书是当今中国各个领域翘楚、行业领袖人物、国家高层智囊的集体传记,通过他们的口述,重现了他们的成长与创业历程,并以此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、中国人精神气质的重塑,以及时代变局下,中国社会不同寻常的发展轨迹和成长逻辑。

伟大梦想是拼出来、干出来的。中国大时代成就了他们的辉煌,而他们也以自己的勇气和创造力,引领和改变着这个时代。作为站在中国各个行业最顶端的人,在本书中,他们也分享了相关领域最前沿,而且是最富前瞻性的真知灼见与相关资讯,有助于广大读者准确把握行业的脉搏和走向,理性看待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,探索未来的发展与转型之路。

本文摘自《光荣与道路:中国大时代的精英记忆》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编著,现代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。



1978年到2018年,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是一部非凡的戏剧。这一崛起故事的最独特之处,是并无一张清晰、完整、现成的蓝图,而是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行动理念下,由众多充满乐观、活力、想象力和探索精神的个体共同创造的。

改革开放的前30年创造了诸多奇迹。近10年开端的2008年注定不寻常。在汶川地震、北京奥运会高强度冲击着人们的情感,同时也考验着国家的应对能力之后,9月15日,次贷危机波及下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,全球金融海啸席卷而来,中国经济政策也随之大转弯。在此之前,中国已经连续5年GDP增速超过10%,而到2008年11月,出口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负增长,经济政策开始从紧缩转为扩张,全力“保8”。11月9日,中央政府宣布将启动拉抬内需计划,两年内扩张投资4万亿元,其中最大比例部分1.5万亿元,都用于铁路、公路、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。

随着人口红利消失,“城市化”速度放缓,房价泡沫的隐忧浮现,外延式发展模式开始不可持续。房地产狂飙的另一面,是实体经济的低迷。“中国制造”的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逐渐丧失,面临转型的拐点。与此同时,中国经济在2010年左右爆发出新的红利,这一轮是由互联网带来的。

自2010年开始的这些年,互联网的风口变换特别快,而只有勇敢者和幸运儿才能在风口上飞起来。2011年,雷军站在了他认为的风口“智能手机”上,与乔布斯发布iPhone如出一辙,发布了小米手机,小米手机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手机产品。下一个风口是团购,也是在2011年,吴波的“拉手网”成功获得融资,在几个月内引发5000多家团购网站入场,堪称“百团大战”,尽管一年后硝烟散尽,最终只有1%活了下来,“美团”和“大众点评”形成对峙,依然让人们见识到“O2O”(线上到线下)被激活的魔力。之后是微信,2012年,腾讯的微信朋友圈功能上线,仅仅一年多后,用户数即破亿。微信迅速颠覆了之前的博客和微博模式,它让传播变得更加有效,也更加碎片化,极大地改变着

媒体和商业生态。还有2012年张一鸣创立的“今日头条”,以算法精准推送新闻,程维的“滴滴打车”,改变着出行方式。而这些风口,都建立在移动互联网的基础上。

移动互联网时代,一方面,BAT把控着互联网最重要的三个应用入口——百度坐上了搜索引擎的头把交椅;阿里利用淘宝和支付宝重新定义了消费;腾讯则借助微信占据了社交媒体制高点。而另一方面,2016年以来,各种新玩法仍层出不穷:共享单车、直播、快手、抖音……往往是掀起一股狂潮之后,就被更新的产品取代。可以说,互联网颠覆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认知边界,而反过来,它也颠覆和重新定义着自身。

无疑,互联网驱动下的“新经济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。如果说在互联网时代,中国互联网公司还只是模仿者和跟随者,那么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,昔日的模仿者则摸索出了本土化的生存方式和盈利模式,而且已经从虚拟经济继续渗透到了实体经济的方方面面。2016年,李克强总理在当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第一次提出“新经济”:“当前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,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,加快发展新经济。”他强调,要依靠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,推动形成新的经济模式、新的业态,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动力。

大约从2014年起,改革进入“下半场”达成共识。如果说“上半场”的驱动力是投资、出口、消费“三驾马车”,下半场则转向供给侧驱动,转向创新驱动。事实上,从2012年起,中国的GDP增速开始回落。中央政府在2014年提出“新常态”,认为这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变,中国已经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%左右的高速增长,因此,需要“改变一切向钱看的增长方式”。

四十不惑。从1978年到2018年,中国改革开放历经40年,对于经济、政治和文化而言,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转型。这不仅仅是经济体制从“计划”向“市场”转型,也意味着一个几千年来占人类1/5以上人口的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。转型已经发生,也将在未来面临更多的挑战和不确

定性。周其仁说,如果说前40年的改革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那么,现在水面上已经露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,很多石头露出很久了,能否去面对和跨越这些“石头”,是下一步改革的关键。

比如制度建设的挑战。在改革的后半程,学者们一直保持着对制度滞后的警惕。1991年,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提出“制度大于技术”,之后更是充满忧患地呼唤法治市场经济。而2003年,在两大经济学家林毅夫和杨小凯关于“后发优势”和“后发劣势”的著名论辩中,杨小凯的警告发人深省:“落后国家可以在制度不够完善的条件下,通过对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,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。但是,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将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。”

还有中国在世界的角色。在目前全球化逆转的危机下,中国似乎成了唯一在推进全球化的国家。在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看来,中国融入国际秩序经历了三个阶段:20世纪80年代是第一个阶段,中国实行“请进来”政策;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,实行“接轨”政策,以加入WTO之前的努力为代表;第三个阶段则是从21世纪初开始的“走出去”政策,再一次积极出击,“一带一路”将创新出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模式。

对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亲历者来说,对下一步改革的期待也是多元的。一方面,不同代际、不同阶层的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,另一方面,做大蛋糕之后,怎么分蛋糕又构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。而且,影响不仅是物质层面的,也是精神层面的,特别是当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、空气污染等社会问题时。正如20世纪80年代初拍摄中国的刘香成所说,如果说西方国家经历的现代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,一步接着一步,那么,中国经历的现代化就像是高速前进的车。4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专注弥补“失去的几十年”的一种方式,人们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寻求一个物质上安全的未来。如今巨大的变革已经发生,但一个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和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,“中国梦”在精神层面还在延续。

文化记忆

吃元宵的习俗 是怎么来的

人们都知道正月十五是元宵节,而且也知道元宵节要吃元宵。但是,您知道吗,正月十五最早不叫元宵节,而且也不吃元宵。

那么,正月十五最早叫什么节呢?正月十五最早叫上元节。

为什么叫上元节?这得从道教说起。道教文化的核心之一是“三元”神说,所谓“三元”,即上元、中元、下元。

这“三元”都是神官,上元是天官,中元是地官,下元是水官。他们的生日分别是:上元是正月十五,中元是七月十五,下元是十月十五。

在古代,每逢“三元”的生日,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。正月十五这天要举办许多活动,所以人们又把它叫作“上元节”。据史书记载,“三元”节日从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了。《史记·乐书》中记载:“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,以昏时夜祠,到明而终。”

“太一”也叫“泰一”,是春秋战国时代人们供奉的天神。这就是说,到了汉代,正月十五奉祀“天神”的活动,通宵达旦。

因为奉祀天神是在夜里,家家户户都要点灯,于是这种奉祀活动,到了隋唐,逐渐演变成观灯赏灯的灯节。

但直到宋代,才有上元节吃元宵的民俗。

为什么叫元宵呢?元宵的名字是怎么来的?

这跟上元节有直接关系。您想,从汉代起,人们过正月十五上元节,都是成宿成宿地观灯赏灯,热热闹闹的,到了夜里能不饿吗!

按南方人的生活习惯,夜里饿了,要吃点东西,南方人管这叫“宵夜”,北方人管这叫“夜宵”,总之都有个“宵”字。

“宵夜”吃什么好呢?南方人喜欢把糯米团当零食。光有糯米没馅儿不好吃,于是人们把它包进了馅儿,取名“汤圆”。

到了宋代,先是南方人,后是北方人,把“汤圆”作为上元节的“宵夜”,因为是上元节的夜里吃的,所以人们又把它叫“元宵”。后来,逐渐演变成正月十五吃元宵的习俗。

再后来,也就是到了明清时代,老百姓干脆把上元节改叫元宵节了。

如今,元宵在南方依然叫汤圆、圆子,做法是用糯米面直接包。北方人聪明,根据摇煤球的经验,发明了摇元宵的方法。

元宵的品种很多,在老北京以“八宝元宵”为最佳,据说这是正月十五宫里御膳房给皇上做的,现在市场上很少见。次之是“桂花元宵”,也很少见,因为在北方的正月,桂花很难淘换。

20年前,每到元宵节前,北京的副食店和老字号饭馆门前,就摆上摇元宵用的铁制的大笸箩,笸箩下面有能转动的发动机,发动机一开,铁笸箩就来回“摇”,职工现场加面添水,现摇现卖。这也是当时京城过正月十五的一景儿。

(选自《文汇报》)